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从这里唱遍全国

—— 戍边丹心曲

□ 潘生林

艰苦奋斗精神永放光芒

高立业,第一任阿拉马力边防站站长;刘守宪,第一任阿拉马力边防站教导员;梁庭明,顾千明,张孝勤,潘世勇,盛致荣,荣德才……这一个个一直在延伸的名字,凝结着对祖国对人民无限忠诚的伟大戍边精神。

阿拉马力边防站曾有四幅对联:三间泥糊石垒屋,十个立志戍边人。十口心思,思家思国思边关;二十只眼,观山观水观日月。热血腔里耀忠心,戍边路上留诗魂。一口锅三块石垒灶,煮烫炸熬样样香;两把锹十双手建卡,掏挖铲旋般般精。

四幅对联集中表达了哨卡第一代建卡戍边官兵艰苦建卡、忠诚戍边的坚强决心,表现了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青春热血凝练的忠诚。

第一代建卡戍边人中,1963年入伍来哨卡的战士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他们年龄都在20左右。抱着戍边卫国的伟大志向,把人生青春年华献给了建卡戍边事业。

郭仁杰、刘治民是那一批新兵中的佼佼者。读书多,文化素养高,来哨卡不久就安排放羊。这羊官一当就是半年多。哨卡四周重峦叠嶂,沟壑纵横,还要防范狼狗。半年多放羊吃尽了苦,跑断了腿,人瘦了一圈。

哨卡防区,春天姗姗来迟,秋天款款早来,早晚温差大。在执行戍边任务时,说风就是雨,雨还未停,飞雪又到;单衣未干,棉衣又湿。来不及防冷加暖。吃饭无规律,冷热无保障,几乎人人都不同程度的患有“三炎”:鼻炎、胃炎、关节炎。高寒山区的严酷的气候条件,历练着哨卡官兵“越苦越累心越甜”的戍边意志。

高立业带领十名官兵,在十分艰苦的条件

下,完成建卡戍边的任务,不是靠一时的热情,是靠信仰的坚定,对祖国的忠诚,对信仰始终不渝的追求。

1962年第一批建卡戍边的十位官兵,大都是解放前或五十年代参军入伍的,都把个人的困难压在心底,从不吐露。人人一门心思守边卡。一直到1963、1964、1965年期间,哨卡人手极少,建卡施工劳动与站岗、巡逻、潜伏连轴转,往往是夜哨连续两班岗,下哨又去割红柳编哨楼;夕阳西下,巡逻回来,晚餐后借着月光挖水渠、炸山修路,打围墙,修梯田,建菜园,修碉堡,建吊桥,栽白杨,种榆柳……

1963年来哨卡的刘治民、郭仁杰、张化民、刘兴仓、王哲斌、贾吉祥、侯生才、赵金仓等,都是陕西籍当年的高中毕业生,但他们听从祖国召唤,毅然参军入伍来到哨卡,无怨无悔。面对艰苦的生活和自然环境,把“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心甘情愿,自我苦吃”当作正确价值观的核心,以此要求自己,磨砺自己,各个都成为各项工作的能手:喂马钉马掌,放羊防狼狗;施工不惜力,训练有奇招;孤独寂寞有歌声,文化宣传有新意。为《话》歌的创作,为阿拉马力哨卡的戍边建设奉献了青春年华。

当时建卡戍边急需的生活设施,戍边瞭望设施,一件件、一桩桩火烧眉毛。他们和老战友一起,不等、不要、不靠,在完成瞭望、巡逻任务的同时,充分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脱坯,筑瞭塔;挑断山梁,削去半拉山,扛原木栽木柱建吊桥;挖壕掘石,填沟垒渠沿,建成数千米高山水渠;峭壁点炮,钢刨铁铲,千丈山腰刨出拉水道……

这里是一所天下少有的大学校。第一代建卡戍边人完全用解放军大学校的宗旨、要求,建

卡守卡,履行戍边使命。他们自力更生,历练了战胜自然环境、克服艰苦生活条件的品质、意志,最终战胜了自己。《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这首歌是第一代建卡戍边人向祖国交出的一份合格答卷。

哨卡有一项传统,每年一季度为爱国主义教育季。毛泽东有一段至理名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上世纪60年代参军入伍的农村战士中有一部分战士识字不多,还有的战士没上过学。参军到哨卡后,战士们就如进了学校,学文化、学知识,特别是学政治、学军事。官兵认识到:没有先进理论武装的人是不能适应边防斗争需要的。高立业组织62、63年老兵中文化高的老战士做教师,因人施教一帮一。采取了三个结合的学习方法:既认字又看文章。当时安排,认字与学习《为人民服务》结合;辅导与背原文相结合;写心得与记录本职工作相结合;由于结合实用实际效果显著。

炊事班长李成道,河南籍60年入伍。刚入伍时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上。哨卡忠诚戍边学文化浓厚的氛围,激发了他的学习决心。他书不离手,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学习,马灯耗煤油,就借着灶膛的火光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铁棒终究磨成针。还在炊事工作中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反复实践使每天的耗煤量下降百分之20%,被评为节煤积极分子,文化程度也有大的提高。他写了一幅对联:“灶膛添黑金,熊熊火焰旺,炼铸金心铜胆;锅台摆战场,般般厨艺精,烹调美味佳肴”。对联贴在饭堂墙上的学习园地栏中,受到全哨卡战友的高度称赞。(连载三)

陈云(1905—1995),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的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和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也与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

关注报刊的发行

1930年8月15日创刊于上海的《红旗日报》,自第162期开始成为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机关报。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外县工作委员会委员、上海工作委员会委员的陈云,专门对《红旗日报》发行情况进行了调查,当他发现《红旗日报》的发行量不过2000份时,便在出席中共上海各区委、各产党团书记联席会议上强调:要注意扩大政治宣传,努力推销《红旗日报》。1930年10月初,陈云再次指出:党报不仅是政治宣传工具,也是群众的组织者,应建立全省党报发行网和通讯网。10月下旬,陈云为中共江西省委起草了《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关于红旗日报工作大纲的决议》,对建立党报发行网和通讯网作出了许多具体规定。《决议》发出后,党报发行网、通讯网的建立工作得以迅速发展。到1932年底,全省自上而下独立的发行网、通讯网基本形成。

1932年3月,陈云被任命为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后,更是对总工会宣传部的工作和机关刊物的出版发行给予密切关注,要求在领导工人运动时,一定要把宣传品发到工人中去,要求宣传部的报纸编辑委员会要有专人负责。在这一时期,陈云参与了《苏区工人》报的宣传发行。《苏区工人》报作为当年中央苏区的第一份工农报刊,主要用来指导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工人运动。

为报刊把脉定向

1944年3月,陈云出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为了掌握经济动态,开始了细致入微的调查研究,指导编印了《经济参考消息》半月刊,主要从国统区的各种报刊上摘选财经资料和行情变化讯息。该刊在陈云的主张下,提供给业务部门干部参阅,并送中央领导同志研究。陈云通过报刊对经济情报的搜集,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和大力支持。

1947年7月,由《安东日报》《辽宁日报》合并创办了《辽东日报》,作为当时中共辽东分局机关报。为了密切配合当地的工作开展,时任辽东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的陈云为《辽东日报》确定了“军事宣传和土地改革”的宣传重点;制定了“全党办报,大家写稿”的办报方针,并将办报工作形象地描述为“一手拿枪,一手拿笔”。

1948年10月28日,陈云亲自布置了进入沈阳后要散发的军管会布告和《沈阳时报》等工作。在随后的宣传工作中,陈云特别提醒:第一,各种布告和解放区一般新闻,不能一下子苛求内容生动,适合新区群众口味;第二,对于转载旧的文件,要有选择;第三,一切布告,必须字斟句酌。排字校对,都用原报社的工作人员。在陈云的主持下,党的宣传工作者顺应民意开展宣传,为沈阳城市接管和社会改造营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作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尽管工作千头万绪,却仍然不忘为报刊把脉定向。1980年12月29日,陈云对《人民日报》提了意见,认为:《人民日报》发表了很多好文章,但是有些太长,很多人没有看,很可惜。如果加一个提要,标一些小标题,文内分一二三,人家忙了也可以看一个要点。所以,“报纸要改进,要争取他们看,要争取更多的人看,这很重要”。1982年5月11日,陈云又向《人民日报》提出报纸要为广大读者着想的意见:“报纸要为广大读者着想,报社的领导和编辑要经常提醒自己:‘假如我是读者’,‘假如我是一个很忙的读者’,《人民日报》为人民嘛。”他说:“文章越长,看的人越少;越短,看的人越多。应当多写点‘豆腐块’文章。”1988年2月,《人民日报》创刊40周年,陈云应邀题词:“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连载一)

甘肃人物

首倡“引大入秦”工程的一代廉官王树中

□ 王立仁

王树中(1868—1916),字建侯,兰州市皋兰县人,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科进士,长期在安徽和县和亳州府任职,勤政爱民、清廉刚正,深得民众尊崇,被皖人称为“王青天”。

王树中为官的年代正值大清王朝行将就木,整个国家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灾荒遍地、贪贿公行、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王树中为官秉持“只问苍生,略无瞻顾”的准则。为了匡正和县“健争讼”的民风,他坐堂审案犹如老嫗之话家常细致排解;深入民间“娓娓谈道义,如父兄师长之教子弟”。他大力崇文尚义,推行教化用自己的俸禄购买书籍赠送给乡间子弟,一年后民间争讼案不及原先十分之一。太和、亳州一带连年受灾物资奇缺,王树中知难而进,千方百计赈济灾荒,每天要解决上万人吃饭用药,又要带领民众抗旱,废寝忘食昼夜操劳,累得倒在现场几乎殒命,而亳州却因此有数十万人得以存活下来。太和县水患严重,耕地多废,社会矛盾多发,流民贫民遍

布。他全面查勘精心规划,对境内十条河流进行疏浚使之畅通,让太和县从此五谷丰登、祥和安定。他执法严明、不惧豪强和洋人,让太和县的教学处理“顺若流水”,洋教士心服口服。而民众得知他到来时“奔走欣欣,以望见颜色、得闻片语为喜”。他调离亳州时,上万人自发涌上街头请求留任。

民国初,王树中担任甘肃省军政府参谋和省教育会会长。他受命前往天祝县大通河源头实地考察,归来后提出了开渠引流济秦王川之旱、广开良田的计划方案,是提出“引大入秦”工程的第一人。他受命巡访全省各县,体察民情并就地解决突出矛盾,不到一年就走遍了陇上76个县中的大半。当时社会上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极难处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为之、君独慷慨任之”,所到之处一一平复人心、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后因长期辛苦健康大损,不幸在49岁之际英年早逝,时社会各界、家乡人民皆深为痛惋。灵柩返乡之

日,沿途各村庄无数乡亲致路祭最高礼仪。

王树中为官清廉一生,追崇儒家“大同”思想,衷心拥护孙中山先生民主共和愿景,且以优良家教家风传承后人。长子王毓琳(王孔璋),是甘肃省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他少年之时即向往革命,1927年入党,以后在中共甘肃特支领导下积极投身革命活动,与特支贾宗周负责党的宣传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遭国民党当局逮捕,虽经严刑拷打依然坚贞不屈,遂被判处死刑。幸得三弟王毓泰(即王和生)积极营救,三年后始得逃离虎口,但是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于1944年过早离世。至于三儿子王毓泰则因为进步的思想,卓越的才华和对甘肃文化体育事业的杰出贡献而广为人知。

王树中逝世后,其挚友、陇上大贤刘尔斯有挽联赞曰:

不愧为良有司,热血丹心,能使苍生呼父母;
毕竟是奇男子,空拳赤手,只将白水付儿孙。

红色记忆

见证武汉解放前中共地下党活动的宣传品

□ 李奎清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兵锋直指武汉,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司令长官白崇禧率国民党军队从武汉仓惶逃离。5月16日至17日,武汉三镇兵不血刃获得解放,广大市民载歌载舞,欢庆江城回到人民手中,武汉的历史从此翻开新的篇章。在武汉解放前夕,中共武汉地下组织冒着流血牺牲的风险,开展秘密活动,进行统战策反,为武汉的顺利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江汉军区鄂中分区域城工部油印的《新华电台特讯》(图一),纸质,油印于1949年4月21日。上部用艺术字体注明宣传品名称“新华电台特讯”及编印单位“江汉军区鄂中分区域城工部印”,印刷时间是“一九四九四月二十一日”。“特讯”下面有“第一版”字样。下面的内容区,刊载了来自解放区的新华电台报道内容,第一条醒目地刊载了《南京反动政府拒绝人民和平要求,毛主席朱总司令颁布四项命令》的标题及命令全文,在指出和平协定破裂是因为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之原因的同时,对各野战军发布了“解放全中国,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的命令。左下角刊载了人民解放军在太原战役中获得重大胜利的消息。中共地下党城工部秘密收听、抄录、印刷来自新华电台的新闻信息在武汉三镇张贴、散发、邮寄,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宣传了解放区的政治方针,瓦解了国民党守军军心,对策反国民党武汉高官亦起到了一定作用。

武汉解放前,中共武汉地下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地下活动。据1946年6月15日中共武汉市委给中共华中局的反映武汉解放前地下党情况报告显示,中共武汉地下组织的主干是由中共武汉市委领导的390名党员及1500至2000名党外核心分子;另一系统是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及各解放区党委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计11个城工部,共有派遣人员和各种城工关系约2800人,其中党员50余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约950人。

中共武汉地下组织运用各种条件,建立秘密收听站、地下印刷厂,通过收音机收听抄录新华社及各解放区电台广播,大量翻印《新民主主义论》《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毛泽东著作及中共中央文告等重要文献,创办油印小报。中共江汉区党委城工部余杰领导的城工人员将通过收音机收听抄录的新华社及各解放区消息及时刻版油印成《新华电台特讯》宣传品,秘密张贴、邮寄和散发,在加强当前形势、中共政策的宣传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中原中央局武汉工作委员会《致武汉人民书》(图二),纸质,竖行排列。告示形式,针对武汉解放后国民党工作人员、国民党残余军队、国民党特务人员、工商业及国民党各机关、各单位、知识分子分别制定了完善的政策。前面引文开宗明义,振聋发

聩:“……当此人民解放军在进攻中节节胜利,新的革命高潮正在向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美国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统治业已临到最后崩溃的时候,华中工商业的中心城市——武汉,也已经临到解放的时候了。”



准其悔过自新,将功赎罪。对国民党官兵,只要放下武器,战斗结束后一律尽早释放;起义及配合我军行动的官兵,一律按照人民解放军军制改编,政治上与人民解放军一视同仁,待遇亦与人民解放军军一律平等。对国民党中统局、军统局及其公开和隐蔽的特务机关等一切反动组织,应立即解散,停止活动,各该组织人员要依法向指定的机关登记,交出武器和一切反动证件,分别首要、胁从,从宽发落,而对隐瞒不报或潜谋活动者,一经查获,定予严办,并要求所有旅社、公寓、医院、

茶馆、戏院、妓院均不得包庇隐藏国民党特务人员,否则一经查出当予以惩罚。对于国民党公办企业、商店、医院、房地产、市政机关及其各单位,是人民自己所有的财产,将妥为保护,不得损坏、拆卸、转移,等待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后予以接收。属于私人的企业、商店、医院、房地产,都在保护范围之内。为稳定市场,所有民营工厂、商店要继续开工、开市,加强生产,照常营业。对与官僚资本有联系或与之合股的私人企业,将分清官僚部分和私人部分,分别处理。并要求所有工厂、企业生产部门的职工严守岗位,照常工作,加强保护,继续生产,为人民服务。对有决心、有思想、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希望他们“大批的参加到人民解放事业和新民主主义建设事业中来”,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骨干”。《致武汉人民书》的最后,认为“保护一切公私财产是每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公务人员、人民解放军战士,及一切民主人士神圣的革命的责任”,呼吁“全武汉各阶层人民,一致上下协同,在目前各安生业共同维持社会秩序,协助人民解放军顺利完成解放全武汉的工作”。这份《致武汉人民书》是中国共产党中原中央局武汉工作委员会制定并印发,旨在武汉解放后,面对各个方面的情况在城市里实施多项政策,稳定人心,维持社会秩序,为即将建立的人民政权打下基础。